

读,这是当下此类风险事件治理中的逻辑难点。在茂名 PX 项目事件的田野调研中,几位接受深度访谈的体制内行动参与者,也提到了在参与前的观望和考量,但或许《身份政治》本身就给了一个解答,在参与事件过程中相关环节的“族群认同”或“社区认同”是主要的驱动因素。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在说明,在探讨重大突发风险事件治理过程中,媒介治理能够彰显其有效性的深层逻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21&ZD3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SIOCHRÚ S Ó, GIRARD B. Global media governance: a beginner's guide [M]. Wash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2]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38.
- [3] 李春雷, 马俐. 政府信任构建与大众传媒对拆迁心理的引导机制研究——基于唐福珍自焚事件的实证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2013, 35(5): 62-73.
- [4] 马凌. 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 [J]. 中国传媒报告, 2008(2): 38-44.
- [5] 李春雷, 姜红辉. 群体性事件中媒体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影响研究——基于“乌坎事件”的实地调研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 35(7): 37-42.
- [6] 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5.
- [7] 孙玉胜.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 [8] 李春雷.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媒介文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78-185.
- [9] 李春雷, 贾立平. 突发事件中传统媒体沟通党媒意见与网上舆论的进路研究——基于“什邡事件”的实地调研分析 [J]. 国际新闻界, 2015, 37(11): 90-104.
- [10] 祝华新. 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J]. 当代传播, 2011(6): 81.

悬崖之边: 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风险的 A 面、B 面与 C 面

张 健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在社会转型与媒介化语境下,重大突发事件以其巨大的突然性、威胁性、破坏力将国家认同结构置于“悬崖之边”。从全球化视野而言,国家认同“是指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对某一国家的身份感”^[1],是作为特殊社会政治组织的国家与疆域内的公众之间所达成的“我们是谁”的社会“合同”,同时还是国际体系中本国与他国之间关于“我(国家)是谁”的谈判“契约”。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行动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和目的,二是行动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2] 本文将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行动者高度抽象化、类型化为政府、公众以及国家体系中的他国三类,尝试回答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为何对国家认同暗藏风险。

风险 A 面: 责任政治的传播反噬

政府是国家权威付诸实施的手段,是国家的“大脑”。^[3] 当损害与时机都无法预知的重大突发事件在某个时空中突然引爆时,政府作为国家的授权代理人必须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资源与调度能力来履行自己作为公共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以换取公众对国家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信任感、归属感。因而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及其相应的媒介化表征,包括事件的进展、信息的发布、舆论的引导、责任的查究与归因、组织性的反思与调整,就成为了制度化、模式化及系统化的危机管理处置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即“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

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22]。就话语符号而言,如布尔迪厄所示,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代表国家的政府控制了所有行动的提名权,从而使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被安排和预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颁布给既定范围的既定人员。^[23]政府、机构媒体以及辅助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专家群体都是类似的“既定人员”,责任政治的逻辑从微观上与宏观上支配着突发事件的媒介化表征:微观上对突发事件发展过程中涉及人物、损伤、措施、过程、细节及最新进展进行持续“直播”,并预测政府与专家们后续的应对策略;宏观上对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当事方的利益关系、事件的未来走向,特别是对国家、社会的负面冲击、可能的应对路径进行解读和研判。

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表征具有鲜明的前台化倾向。媒介的逻辑从属于政府对事件的处置逻辑,如领导的指示批示与靠前指挥、连续数场的新闻发布会或通气会、应急人员的所见所感、伤员与财产损失情况、奋不顾身的“逆行英雄”等这些镁光灯闪烁的“前台”部分,而事件引发的政府高层反应、各利益方的磋商、原因与责任的查找等则属于看不见的“后台”,“媒介逻辑在体制许可的空间内、以体制许可的方式展开,那个可视的、在‘前台’被公开展演的媒介逻辑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目标”。^[24]

媒介化表征中存在“聚焦”与“失焦”的非均衡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政府的危机处置与行政效率固然是媒介关注的重点,但公众却是重大突发事件中危害性、威胁性的主要承受者。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表征更多地聚焦于“政府怎么想”“怎么做”“有了哪些成效”,而公众却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失焦”了,处于模糊与缺失状态。“公众怎么想”“公众担心什么”“公众害怕什么”被忽略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重大突发事件“治理的主要任务不是进一

步强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与沟通,因为在群体性事件中,老百姓怎么想的比政府官员怎么想的重要得多”^[25]。

重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这种以责任政治为主要表征指向的传播秩序在行动惯习的循环链条强化下,机构媒体在信息独占的同时,其表征话语走向形式化、仪式化与程式化,成为国家认同与责任政治的话语操演,政府人士、媒体以及专家成为“福音传播者”^[26];形式化、仪式化与程式化还可能衍化成为一种“照章办事”“照抄作业”的重复性路径依赖,特别是当突发事件上升成为国家层面的法律与制度时。甚至在常规与程序的“路径依赖”中,重大突发事件的传播秩序在某个更根本的层面上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尽管政府与机构媒体尝试各种富有想象力的调适,试图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打通信息分享的“最后一公里”,但并未从根本上造成秩序类型的改变,如卡斯特所言“由于现存政治体系仍奠基于工业年代的组织形式与政治策略……它所依赖的信息流动也使它不再具有自主性。”^[27]

处于锁定状态中的传播秩序可能会引发重大突发事件媒介化表征的话语失真、话语冗余、话语壅塞、话语“扯淡”,甚至导致责任政治传播的“体制性迟钝”,致使其处置突发事件陷入了“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28]政府在专业人士辅助之下实施的所谓危机应对与管控,特别在舆论管理方面以责任政治为中心的传播便成为自反性的“阴暗面”,孕育了安东尼·吉登斯意义上的国家认同“风险”,即“生活在高度现代性所生成的‘世界’里,会有力不从心的感受,它不仅仅在于发生了多少持续的深刻的变迁过程,而且在于这种变迁并不总是依从于人类的期望或人类的控制”^[29]。

风险 B 面: 向心力的流失

从国家与公众之间的认同“合同”而言,重大突发事件正是国家/政府与公众双方“履约”的关键时刻,政府良好的处置力、执行力与领导力尤为关键。“绝大多数人都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团体的功能性利益的角度来确定‘效用’和‘效率’的内涵,并以能否满足人们对这些‘效用’和‘效率’的期望为标准来评价、区分‘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1]

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技术的应用以及智能媒体的普及,促使网络空间成为公众发布信息、情绪表达、心理期盼的虚拟集散地,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力、执行力与领导力不再由政府与机构媒体“乾纲独断”,因为“生活在‘媒介化’的社会……意味着我们可能以传媒技术为资源,改造时刻笼罩、制约着我们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体系,或至少改造我们与它们之间结构性关联的形态……意味着我们可以运用传媒技术建构——创造和再现——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篇章”^[2]。这种作为“元过程”的深度媒介化同样深刻地塑造和雕刻了重大突发事件在公众心目中的感知、认知与判断,政府与机构媒体凭借把关人与议程设置机制决定公众可以“看什么”“怎么看”的格局早就不复存在,重大突发事件从危机引爆的那一刻起,政府的处置力、执行力与领导力便事无巨细地暴露在全民围观、全民凝视、全民评说、全民监督之下,政府行政能力的效率与效用的话语权从政府与机构媒体转移到了公众手中,数字媒体赋能给公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的最终决定权。

如斯洛维奇所言,不管在科学技术上训练有素的分析家们如何采用风险评估机制去测评重大事件的危害,绝大多数的公众依靠直觉来获得风险感知。^[3]从微观上,突发事件内在的新闻性质素、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利益相关方或间接相关方的冲击力迅速成为全社会的

热点,公众以文字、视频、音频、表情包等所有技术手段来共享突发事件的方方面面:微观层面,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专家群体对突发事件的处置、分析,包括内部会议、文件通知、资源的分配与调度、与公众互动时的言谈举止等等,政府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置于公众的放大镜下,尽管政府及机构媒体试图垄断相关敏感信息;中观层面,当政府应对过程中出现各种人员、资源与措施的失调时,特别是事件中的人身处危机之中却无法获得应有的救助、帮助,甚至在多部门之间被辗转推诿、求告无门时,社交媒体便以戏剧化、个人化、视觉化、过程化的个体叙事,促使公众结成各种“紧急共同体”“团购共同体”,彼此交换、转发各种信息、谣言、留言、流言、质疑、哭诉等,形成群体化的认知与判断,构建出重大事件的“同温层”效应,线下与线上社群的“抱团”极化现象使得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4];宏观层面,各种关于政府的既有简单认知、流行性假设、非理性有罪推定、真假莫辩的阴谋论、充满戾气的仇恨言论等便会因为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与政府应对的疏漏、迟缓、失范而在各种数字媒体上不经而走,甚嚣尘上,勾起种种“互联网记忆”,将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推向“泛情绪化”“泛道德化”“泛政治化”。

某种情形下,重大突发事件甚至可能在“有心”人士非政治正确框架的裹挟下被涂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在经济、科技、教育改革、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强行与政府、政党或体制、矛盾或问题挂钩,演化成社会信任危机: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问题,主要存在于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官—民”信任危机,即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问题,^[5]“对民众的政治参与、党和政府公信力、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与自信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威胁国家政治安全”^[6]。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

公众舆论狂潮是公众与国家之间“无法精准履约”“履约失效”，甚或“单方违约”的结果，而在这种效力与效率的“违约”冲击下，认可、赞同与忠诚的国家认同结构有可能成为最可怕的牺牲品之一，因为“人们一旦感到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感到在社会上处于无根的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具有建立一个稳定、现代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那种坚定的认同了”^[1]。

风险 C 面：对中国性的“解概念化”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际语境下的国家认同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国家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这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因此国家认同具有主体间性特征。^[2]塞缪尔·亨廷顿也提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3]，比如“美国人怎样界定自己的国家认同，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中，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帝国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一个民族性质的国家”^[2]。

职是之故，从利益关系、责任主体及其对冲击性、伤害性、威胁性的感知而言，同处国际体系中的他国很难对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国家真正“感同身受”“日月同天”，但是如“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所揭示的一样，处于安全困境中的他国仍能够感知到重大突发事件的强烈外部性与衍生影响，因为全球化导致“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4]。国际竞争中的他国出于国家利益与外交战略的需要，以政治媒介化来抢夺重大突发事件的命名权、话语权，瓦解所在国对突发事件的定义与判断，并以国际体系中所谓通

行的惯例、规则或国际法名义，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反向命名、戏剧化甚至污名化。比如境外媒体对中国涉港、涉疆、涉台以及南海等议题的报道中通常会有相同的叙事脚本：被压制的人权、表达权，强势的政府，弱势的“抗议者”以及“帮理不帮亲”的美西方国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国这些重大事件时常使用“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中国”“中国共产主义政府”，涉及中美分歧和争议的问题通常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将争议和争议问题溯源到中美两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5]

他国在建构“我（国家）是谁”的身份认同之时，往往试图将潜在的竞争对手妖魔化或他者化，因为“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需要证明自己群体的优越性。竞争导致对立，使本来较狭窄的区别感导致强烈和较根本性的同异感。这种认识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2]。比如西班牙学者认为，美国和北约将“俄乌冲突”定位为“良知殖民化的全球心理和认知战争”，“这种新型战争形式的目标不再只是改变我们思考的内容，而是改变我们思考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因此，军事目标是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所有人口，而目的是系统地损害他们的认知能力”。^[6]

在主体间性视野中，重大突发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将国际对手他者化或妖魔化的机会或潜能。至少从国际体系或国家间性而言，作为对手或敌人的他国试图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或观点的扩散、渲染、污名，修改或动摇中国自身国家属性的定位，包括国家主权、国体、政体乃至各种制度、政策、措施。从“认同”这一概念最基础的“同一”意义上，国际体系中的竞争性他国所进行的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传播，是对中国国家认同核心与基质也即所谓“中国性”的“去概念化”或“解概念化”。在持续的“解概念化”的报道与评论中，中国公众有可能将自己国家层次的认同对象进行散逸、虚化甚至转向、投射到他国之“国家

性”上,中国的国家认同由此受到所谓“全球认同”或“他国认同”之渗透与辐射的风险,出现所谓“逆向认同”和“反认同”问题。

重大突发事件使得媒介化场域中的三类行动者激活起自身的资源与话语框架,将中国的国家认同置于如约斯特·房龙所说的“虚拟风险”中,“不能通过先验的逻辑(如反事实的思考)或粗略的经验观察来‘确定’。它存在于此类虚拟事件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24]。假如“国族的存在就是日复一日的公民投票,就像个体人的存在是生命的不停宣示一样”^[25],那么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实际上正是公众对国家与国家认同的一次宝贵投票机会,也是本国向他国展示自身民族团结的难得机遇。政府如何在“危难之处显身手”,与公众彼此靠近,获得和解与修好,值得进一步的深思。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21&ZD31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张军. 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2(2): 1-9.
- [2] 韦伯. 经济与社会 [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4-56.
- [3] 海伍德. 政治学核心概念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48.
- [4]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 赵旭东, 方文,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5] 华康德. 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 [M] // 陶东风, 金元浦, 高丙中. 文化研究: 第 4 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22-23.
- [6] 闫文捷, 潘忠党, 吴红雨. 媒介化治理——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11): 37-56.
- [7] 童星, 张海波.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 [J]. 学术界, 2008(2): 35-45.
- [8] 彼特沃克. 弯曲的脊梁 [M]. 张洪,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41.

- [9] 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M]. 夏铸九, 黄丽玲,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360.
- [10] 黄骞, 朱立毅, 肖文峰. “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J]. 瞭望, 2007(24): 6-7.
- [11] 山口定. 政治体制: 宏观政治学 [M]. 韩铁英, 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 216.
- [12] 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 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媒体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 [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153-162.
- [13]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New York, N. Y.), 1987, 236(4799): 280-285.
- [14] 李彪. 社会舆情生态的新特点及网络社会治理对策研究 [J]. 新闻记者, 2017(6): 66-71.
- [15] 周莉.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传播与管理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5.
- [16] 蒋明敏. 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泛政治化风险: 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 [J]. 青海社会科学, 2021(6): 82-91.
- [17] 派伊. 政治发展面面观 [M]. 任晓, 王元,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81.
- [18] 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65-306.
- [19]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134.
- [20] 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 [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21] 鲍曼. 全球化: 人类的后果 [M]. 郭良, 徐建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3.
- [22] 樊吉社. 美国涉华舆论的现状与特征 [J]. 对外传播, 2020(6): 11-13.
- [23] 博内特. 颠倒是非 外媒揭露西方如何在乌克兰进行“心理战” [EB/OL]. (2022-04-04) [2022-04-20]. <https://mil.ifeng.com/c/8EwSNqTLf7U>.
- [24] 房龙. 人工智能复制时代的虚拟风险 [M] // 亚当, 贝克, 房龙.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 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 赵延东, 马缨,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261.
- [25] 勒南. 国族是什么? [J]. 陈玉瑶, 译. 世界民族, 2014(1): 59-69.

责任编辑 罗 欢